

## 第一章 《雷雨》、《画中情思》的作者及其相似创作背景

在解读《雷雨》和《画中情思》中的主人公形象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这两部作品的作者以及各自的创作背景。曹禺和西巫拉帕身上以及他们各自生活的中国和泰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也许正是因为这些相似之处，才造成了《雷雨》和《画中情思》中存在着诸多的相似点。

### 第一节 曹禺和西巫拉帕

1934年，曹禺发表了《雷雨》，它的诞生就像一颗春雷，震撼了当时整个文坛。彼时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为《雷雨》的日译本作序，称赞道“《雷雨》的确是一篇难得的优秀的力作”，“作者在中国作家中应该是杰出的一个”<sup>[1]</sup>。而曹聚仁更是在他的《文坛五十年续编》中说，1935年“从戏剧史上看，应该说进入<雷雨>时代”<sup>[2]</sup>。可见，《雷雨》在当时的影响是多么的空前。1937年，即《雷雨》诞生之后第三年，西巫拉帕发表了小说《画中情思》，这是泰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的现实主义小说，它奠定了西巫拉帕在泰国现代文坛上的地位，在泰国的现代小说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曹禺和西巫拉帕能够创作出《雷雨》和《画中情思》这样的名作，全面的文化修养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条件，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共同的人道主义情怀，对他们的创作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一、全面的文化修养

曹禺，原名万家宝，原籍湖北省潜江县，1910年9月24日出生于天津。他出生后三天，其母就因产褥热不治身亡，其父万德尊出于对亡妻的怜爱，遂将全部的爱倾注到曹禺身上。后来的继母——曹禺母亲的孪生妹妹——对曹禺也非常的疼爱，视曹禺如己出。自小，曹禺就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不仅家里聘请了一个旧学根基扎实的老师来教他，而且他的父母也都是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典型。“最有意思的，是父亲和继母抽足了鸦片烟，过够了烟瘾，这时，闲情逸致便油然而生，变得兴致勃勃了。于是，便把添甲（曹禺小名——笔者注）喊到床前，听他们背诵古诗词，让添甲也跟着背。继母爱看《红楼梦》，她把黛玉的《葬花词》背得滚瓜烂熟。”<sup>[3]</sup>在这样的家塾教育中，曹禺小小的年纪就已经系统地读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左传》、《史记》，甚至《道德经》、《易经》，在进入中学之前，

[1]郭沫若.沫若文集·关于曹禺的<雷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113

[2]田本相.曹禺传.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183

[3]田本相.曹禺传.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21-22

他又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镜花缘》、《西游记》，还有《红楼梦》，可以说这些传统的文化思想在孩童时代就已经深深地渗入到了他的心灵，融入到他的个人气质与生命体验中。此外，曹禺的继母酷爱看戏，每次去看戏都带着曹禺一起去。因此，曹禺在继母的熏陶下自幼也就爱上了戏剧，成了一个小戏迷。“那时，天津荟萃了不少著名演员。谭鑫培、刘鸿声、龚云甫、陈德霖、杨小楼的戏，他都看过。”<sup>[1]</sup>童年时代与继母一起看戏的生活，在曹禺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戏剧的种子，使他悟出了：“戏原来是这样一个美妙迷人的东西！”<sup>[2]</sup>这为他日后走上话剧创作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曹禺十岁那年，父亲将他送到天津的汉英译学馆学习英语，之后报考天津的南开中学。在南开中学就读，特别是加入南开新剧团的经历是曹禺人生中的一段重要经历。一方面，南开中学开放的学风使曹禺得以接触到当时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的大量作品、刊物。他曾经说过：“我 13 岁就读了鲁迅的《呐喊》。……《孔乙己》、《社戏》、《故乡》、《祝福》就给我以深深的感染。……我被震动了。《凤凰涅槃》仿佛把我从迷蒙中唤醒一般。我强烈地感觉到，活着要进步，要更新，要奋力，要打碎四周的黑暗。”<sup>[3]</sup>显然新文学作品中激昂的人生观、热烈的价值观点燃了曹禺心中的热情之火，可以说，曹禺是在“五四”新文学的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五四”精神鲜明的烙印。另一方面，参加南开新剧团，则为他最终走上话剧创作道路铺平了道路。在南开新剧团，他既参与了外国话剧的翻译改编工作，又亲自上台演出，成为剧团的中坚力量。也就是在这时，他开始较多地接触西方文学，特别是戏剧。后来曹禺又进入了清华大学就读西洋文学系。在清华大学，他除了学习英语外，还学德语和俄语，此外更将大部分的时间花在钻研戏剧上。“从西方戏剧的发展史中，去进行系统的欣赏和琢磨。读戏剧史，也读戏剧理论，从希腊悲剧到现代的奥尼尔，从莎士比亚到契诃夫、高尔基。他徜徉在希腊悲剧之中，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底德斯这三大悲剧家的作品使他倾倒。”<sup>[4]</sup>正是大学期间的系统地学习西方文学，使他流连于世界戏剧艺术的长廊，陶醉于世界戏剧大家的作品中，这些戏剧名家给曹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使他在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基础上，又在西方现代文化中得到全新的体验，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在曹禺的创作中总是镌刻着传统文化、“五四”新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三重印痕。

西巫拉帕，原名古腊·柿巴立，1905年3月31日生于曼谷，较曹禺早出生了五年多。西巫拉帕出生于泰国五世王朱拉隆功统治末期，他的父亲是铁道

[1]田本相.曹禺传.北京: 东方出版社,2009.24

[2]田本相.曹禺传.北京: 东方出版社,2009.25

[3]田本相.曹禺传.北京: 东方出版社,2009.48

[4]田本相.曹禺传.北京: 东方出版社,2009.133

部的一个文员，母亲是个农民。西巫拉帕四岁的时候，进入一个寺庙学校念书，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母亲将他转入到一个少年军事学校。那里除了要学习一般的知识外，还得接受军事训练。在军事学校待了两年，母亲实在不忍心看他小小年纪就得像军人一样守夜站岗，所以就又把他转到一所著名的刚刚对平民开放的贵族学校——贴西林中学。在这里西巫拉帕找到了自己梦想起飞的平台，可以说，正是他母亲的不忍之心，造就了泰国现代文坛的一代巨匠。西巫拉帕的父亲曾为洋人工作过，能讲一点儿英语，因此空闲时就教西巫拉帕英语，这该是西巫拉帕最早接触的西方文化。但不幸的是，西巫拉帕六岁的时候父亲就因病去世了。

贫困的家境再加上贫富悬殊的学习环境，让西巫拉帕将自己完全埋在书堆里了。也许他是想从书里找到改变自己命运的方法，也或者是想避开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总之，西巫拉帕在中学就非常地努力，他看各种各样的书，在书中他学到了一些前所未闻的知识。西巫拉帕的女儿 **sulapin**（音译）在回忆父亲时，说到：“母亲说父亲是个很安静但又开朗的人，从小就很懂事、不顽皮，很少被祖母训斥。小时候父亲喜欢跟朋友还有小和尚在离家不远的寺庙里的莲花池边玩耍，喜欢听寺庙里的老和尚讲故事，还喜欢吃过晚饭后自己一个人静静地写作业。”<sup>[1]</sup>中学毕业之后，他到勾顺·勾莫拉占开办的翻译合作讲习所工作，白天教授泰文，晚上教授英文，空余的时间就师从勾顺·勾莫拉占学习写作。此时，他开始接触大量的西方小说，也系统地进行了写作的训练。正是在这所讲习所的工作，让西巫拉帕阅读了许多的西方文学作品，更接触到了西方的民主与自由思想。

此后西巫拉帕主要投身于新闻工作和文学创作中，他担任过多种报刊的主笔、编辑，并任过泰国报业协会主席。这一职业选择对西巫拉帕的影响应该是巨大的。在报社，西巫拉帕得以接触到最先进的思想，也得以了解最真实的社会真相。“泰国大众媒体和留学生中的部分思想家纷纷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宣传西方的民主思想，传播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号召和鼓励人民关心政治，参与政体改革，使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中下层的政府官员、职员深受教育。当时泰国有多份报纸如《城光明报》、《暹罗曙光报》、《青年泰报》和《曼谷政治报》等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外，20世纪初，中国、前苏联、土耳其和日本等国的政体的改变，对泰国政体的改革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sup>[2]</sup>因此，早就投身报业的西巫拉帕，在每天的报社工作中，一点点地接触并吸收了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并一步步地走向了人民，进而成为这股民主运动思潮的引领者。

当然在探讨西巫拉帕身上所具有的文化因子的同时，不可忽略的一点是其

[1] สุภาพ วรโคตร. สตรีทัศน์ ในนวนิยายของ ศรีบูรพา. มหาสารคาม: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มหาสารคาม, 2542

[2] 林秀梅. 泰国社会与文化.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6.52

身上所具有的浓厚的佛教文化色彩。众所周知，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佛教文化是泰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植根于整个泰国民族之中。佛教成为了泰国的国教，并逐渐演变成了一种不可动摇的民族精神。所以，身为一名泰国人，西巫拉帕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佛教文化深刻的影响。（这点我们第三章会继续探讨）。

从文化接纳的角度来看，曹禺和西巫拉帕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一方面，他们都是传统的旧式教育的产物，另一方面，他们又都接受到了现代文化，尤其是西方民主思想的熏陶。新旧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背景使其二人既有传统的文化功底，又具有非常开明民主的思想。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与生活环境的影响下，他们身上都同时地具有多重的文化色彩，也都具有非常全面的文化修养，不仅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更具有新时代的气息，其创作也都兼具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双重特点。

## 二、丰富的生活经历

作家的创作个性是在漫长的生活与创作实践中慢慢培养而成的，它是作家个人特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趣味和艺术才能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而成的。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心血之作，作家是作品生命的创造者，因此我们要对一部作品进行分析就必不可少地需要对作家生平经历进行考察。曹禺和西巫拉帕的生活都同样历经了种种的坎坷，而这些丰富坎坷的生活经历对他们各自的创作也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曹禺的童年是极其孤独与苦闷的。他幼年丧母，虽然后来继母十分疼爱，视若己出，但是这种失去亲生母亲的孤独感与寂寞感却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沉淀在其心中。他常说：“我从小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sup>[1]</sup>生母的死是造成其童年苦闷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他的父亲万德尊则是一个失意的封建官僚，因官场不得志而始终郁郁寡欢，变得脾气暴躁，在家随意发火骂人。曹家也因此蒙上一层令人窒息的阴影。“这样一个父亲，这样一个家庭！那像铅块一样沉重的家庭气氛，那像坟墓一样的窒息环境，注入曹禺童年心灵里的是忧郁是苦闷。他怕，他躲避着；他恨，他逃脱着，他躲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他逃到自己的心里。”<sup>[2]</sup>家，对曹禺来说，从来就不是温馨的港湾、幸福的乐园，而更像是一个可怕的梦魇。也正因此他才更愿意把自己关在书的世界里，去洞悉社会现象，去了解各色的人物，才得以小小年纪就博览群书，为日后的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小时候经常陪伴继母到戏园里去看戏的经历，也在曹禺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戏剧的种子，为他日后的戏剧创作打开了一扇天窗。

在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及后来转学之后的清华大学，曹禺接受了系统的现代文化的教育。也正是在这些教育中，曹禺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确定了自

[1] 田本相.曹禺传.北京: 东方出版社,2009.14

[2] 田本相.曹禺传.北京: 东方出版社,2009.11

己文学创作的道路。在学校他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尤其是西方的戏剧文学作品，其中易卜生、莎士比亚、奥尼尔等的作品最使他着迷。他从这些世界著名剧作家的作品中汲取着营养，慢慢地观察、思索、酝酿，这些伟大的剧作令他沉迷，撞击着他的灵魂，激起他创作的欲望。

1929年，曹禺的父亲去世，家道开始中落，此时曹禺年仅19岁。也正是在这由盛转衰的时刻，教曹禺真正地认识了人生的真实与残酷。平日万家经常是宾客盈门，可父亲一过世，曹禺就真切地体会到了人世的辛酸。他是这样回忆父亲的过世的，“我父亲死后，亲朋离散。……所有的人对我报丧都不起劲，除了李仲可，别的人都不来过问了。家庭一败，立即脸就变了，就像鲁迅说的那样：‘有谁从小康人家堕入困顿的吗？我以为这条路中，大概可以看到世人的真面目’。”<sup>[1]</sup>父亲的死对曹禺的教训非常地深刻，之前曹禺在学校剧团演戏也许都是在体味着戏剧中的人生，但这次却是在体验着自己人生的戏剧，但不是喜剧，而是悲剧。

1931年，“九·一八”事变消息传到清华大学，激起了包括曹禺在内的所有学生的愤慨。曹禺跟几个同学办起了《救亡日报》，通过社论、杂文、漫画等形式发表抗日宣言。后来他又跟同学一起坐火车到保定去宣传抗日活动。1933年，曹禺又参加了抗日慰问团，到古北口慰问抗日战士。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没有袖手旁观，而是勇敢地加入到了抗日救亡的运动中。

同样是在1933年，他终于完成了四幕话剧《雷雨》。1936年，又完成了另一部作品《日出》。这两部话剧既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也对中国现代话剧的成熟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1937年抗战爆发之后，曹禺随任教的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辗转到了重庆，之后又到了四川。1938年与人合作改编抗战剧《全民总动员》，1939年他又创作了《蜕变》，次年发表了《北京人》。1942年，他把巴金的小说《家》改编成话剧。1946年，曹禺与老舍一起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曹禺历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等职，又先后创作了《明朗的天》、《胆剑篇》和《王昭君》等话剧。其间，曹禺于1956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文革期间，曹禺又经历了一次九死一生的劫难。1966年12月，曹禺被红卫兵深夜抓走，从此，被扣上“反动作家”、“牛鬼蛇神”的帽子，不断遭受折磨。他曾被迫住进了“牛棚”，每天打扫卫生、掏大粪、倒垃圾，甚至被送到农场进行改造。这一切直至1976年十月，粉碎了“四人帮”才得以解脱。1996年12月13日，曹禺病逝于北京，享年86岁。

与曹禺一样，西巫拉帕的童年也是不幸的。六岁那年，父亲的病逝给了这个本来就不算富裕的家庭以致命的打击。从此，西巫拉帕就和母亲、姐姐、祖

[1]田本相.曹禺传.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121

父、祖母相依为命。母亲每天替别人做衣服赚钱养家，而姐姐则去表演舞剧赚取一点儿微薄的收入。生活的艰辛，以及父亲的早逝，使得还不到弱冠之年的西巫拉帕就过早地体会到了社会的残酷和人世的无常，同时也唤起了他对世界、对人生、对人的命运的关注与思考。

中学毕业后，他到勾顺·勾莫拉占开办的翻译合作讲习所工作。在这里他一边教授泰文跟英文，一边练习写作，并寄到报社，赚取稿费以接济日趋窘困的家庭。

1929年，西巫拉帕邀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创办了《君子》杂志，并形成了一个文艺团体——“君子社”。该团体聚集了一批当时的知名作家，如雅考、迈阿侬等。他们不满现状，主张变革，反对陈规陋习，要求民主与自由。

1932年，泰国发生了政变，泰国由君主专制国家变成了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政变之后，西巫拉帕担任《民族报》总编，后来又相续创办了《人民之友》与《君子日报》两份报纸，并在报刊中大胆地揭露和抨击当时的执政党及封建贵族。1936年，西巫拉帕远赴日本考察报业，同年年底回到泰国，并以日本为背景写出了极具影响力的现实主义小说《画中情思》。

二战期间，特别是在日本侵占泰国的时候，西巫拉帕积极投身到反日反帝活动中。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西巫拉帕更是因为反对日军侵略和反对泰国政府的政策而被捕入狱。

1947年，西巫拉帕作为一名政治学的学者到澳大利亚研究了两年。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想。回国后，就立刻投身到当时泰国进步文学活动中去。1952年，西巫拉帕被以“在国内外制造动乱”的罪名被当时的执政党逮捕，第二次入狱。在狱中，他完成了长篇小说《向前看》的第一部。1957年，西巫拉帕应邀访问苏联。1958年，又应邀访问了中国。访问中国期间，泰国发生政变，大肆逮捕进步人士，因此，西巫拉帕就一直在中国避难，直至1974年6月16日病逝于北京。

先哲孟子曾经讲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或许正是坎坷的命运、艰辛的生活，再加上勤奋的天性、丰富的生活经历才共同成就了曹禺与西巫拉帕这两位文学巨匠。

### 三、共同的人道主义情怀

16—18世纪欧洲启蒙主义文化运动高扬个性解放的旗帜，反专制、反神权，弘扬人的主体性价值，推动了人类文明的现代化进程。而此时的中国和泰国都还处在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之下。随着西学东渐，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思想开始传播到东方，对古老的东方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西方的人道主义思想强调关心人、尊重人、维护人的权利，宣扬以人为中心，赞扬人的价值，提倡人的尊严，反对封建专制，主张个性解放和自由，而这不可避免地与东方的专制主义产生了激烈的碰撞。

曹禺在他所精心营造的话剧世界中，处处都充溢着浓郁的悲剧色彩，倾注着作家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反封建与个性解放是他作品永恒的主题，当然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坛的主流思想。从鲁迅到老舍，从郭沫若到曹禺，他们无一不是受到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巨大影响，意识到传统专制文化对人性的摧残而走上创作道路的。在曹禺的笔下，宇宙就像一张大网，人在其中挣扎，永远处在压抑与痛苦之中，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心灵受到压抑的痛苦的灵魂，他们在觉醒，在呼喊、在抗争，从繁漪到陈白露再到愫芳，“他们怎样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的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而不知千万仞的深渊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他们正如一匹跌在沼泽里的羸马，愈挣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sup>[1]</sup>在这个悲惨的世界里，有着作家对整个人类、对个体生命，尤其是对女性命运的深深的悲悯与同情，而这也正体现着作家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

西巫拉帕的作品中同样充满了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色彩。在他笔下，穷人、妓女、农民、平民知识分子乃至上层的没落贵族都成了小说的主角。作家以人道主义思想出发，用饱含着同情与怜悯的笔墨刻画了他们的生活，揭示了造成他们不幸的原因。在《男子汉》、《降服》等早期的作品中就开始反映泰国社会、文化、道德中所存在的问题，锋芒指向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而《画中情思》的问世，则标志着作家小说创作的成熟。小说女主人公吉拉娣的悲剧结局，正是西巫拉帕对女性命运，特别是上层贵族女性命运的思考与探索。此部小说创作的缘由，也正是作家本人对当时不少贵族女子被束缚于鸟笼般的家庭中，而得不到爱情与幸福的同情与反思。在《画中情思》这部作品中，通过作家对封建宗法制度的否定及其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同样可以折射出西巫拉帕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

曹禺和西巫拉帕两人以其人道主义情怀，及饱含着激情与爱心的笔墨刻画了各自国度不幸的人们，向读者展示了这些不幸人们的性格及心理、他们生存的环境和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悲剧是将人生中宝贵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雷雨》和《画中情思》这两部作品，在这方面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通过悲剧的形式来唤起人们对女性的关注，对女性悲剧命运对女性悲剧命运的反思。在作品中，也都实现了对女性生活及命运的审美观照，使读者在阅读的同时，体味到不同国度的女性相同的艰辛生存境遇和难以摆脱的悲剧命运。

总之，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兼具的全面的文化修养，以及丰富多彩、颇具坎坷的生活经历，再加上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是曹禺与西巫拉帕这两位不同国度的作家相似之处。也许正是因为这些特点，才造就了中泰两国这两位伟大

[1]曹禺.雷雨·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372

的作家，成就了《雷雨》和《画中情思》这两部作品，也使得两部作品存在着诸多的相似之处。

## 第二节 内忧外患的时代环境

“文学之所以会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点，之所以具有自然科学所没有的民族性、倾向性乃至阶级性，均源于它的社会意识特点，源于社会存在对它的规定和限制。所以无论作家自觉与否，他的创作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所属的社会和时代，表现存在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文化、政治乃至经济的特点，表现受这些特点所制约的社会心理和审美倾向。”<sup>[1]</sup>多年前，易卜生曾对看不懂他的话剧的一位外国读者说，如果了解我，那么请先了解挪威。同样的道理，如果了解曹禺和西巫拉帕，那么也必须先了解他们所处的环境和时代，因为他们都是特定时代背景所孕育出来的。时代造就了他们，而他们又以自己的作品反映了时代，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

### 一、严峻的国内外环境

《雷雨》与《画中情思》都是在一个充满着内忧外患的时代大背景下创作而成的，两部作品的创作时间也仅仅相差三四年而已。此时同处于东方的中国和泰国，同样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也都深陷于重重的危机包围之中。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处于一个强敌环伺、新旧交替的年代。国内自从 1916 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土崩瓦解，中国就此陷入了混乱状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进入一个持续十余年的“军阀混战时期”，民不聊生；而国外英美法日等列强虎视眈眈，欲瓜分之而后快。1894 年，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战败，签订了《马关条约》；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又战败，次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至此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面对这风雨飘摇的动荡形势，许许多多有着良知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并付诸行动，他们积极地去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致力于民众的思想启蒙，以求改良社会，救国救民。这也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这些知识分子包括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人，他们以《新青年》为基地，提倡“民主”以反对封建专制，提倡“科学”以反对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以反对传统封建伦理，提倡“新文学”以反对旧文学。在这场反对腐朽的封建制度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大批的进步文人翻译介绍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有力地促进了新文化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三十年代，中华民族的灾难更是达到了顶点。1931 年，日本军队发动“九·一八”事变，攻陷沈阳，而后占领了整个东北三省；1932 年，日军进攻上海，又在东北建立伪满洲政府；1937 年，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这段时间中国涌现了像巴金、徐志摩、冯至等有着深刻危机感

[1]刘安海,孙文献.文学理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0



的深受外国文学影响的作家，其作品中有着很浓厚的西方文化色彩。他们以笔为武器，为国家的兴亡而奔走呼告，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西方文学译介给中国的读者，积极地传播着外国进步的思想。在此期间，许多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揭露社会问题的外国作家，如易卜生、莎士比亚、莫里哀、契可夫等文学巨匠逐渐被中国读者所熟知。曹禺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下，浓密的战争阴霾始终伴随着曹禺创作《雷雨》的全过程。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泰国社会也在经历着新旧时代交替的阵痛。泰国自古以来一直是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国家，到了 19 世纪，西方殖民者东进，为了掠夺财富与原料甚至不惜发动殖民战争。1826 年，泰国政府在武力的逼迫下与英国政府签订了《伯尼条约》，英国商人自此获得了贸易自主权；1855 年，又被迫签订了《英暹条约》，英国借此控制了泰国的国防和贸易。1896 年在英法两国的武力与阴谋下签订了所谓“伦敦协定”，由此“实际上暹罗被分割成两部分：在东部是法国的势力占优势，在西部是英国的势力占上风。”<sup>[1]</sup>在西方殖民者的蚕食下，泰国也完全成了外国资本的附庸，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1920 年以后，泰国经济状况日趋恶化，1929 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更是给了本就脆弱的泰国经济以灾难性的打击。“当 1930 年代初期大萧条袭击暹罗的时候，那种震荡就来到了。从 1930 年到 1932 年初两年的时间内，大米的价格下降了三分之二，土地的价值下降到以前的六分之一。”<sup>[2]</sup>“出口大米、锡、橡胶、柚木的暹罗，开始受到了很大的损失。1933 年的国家收入同 1929 年相比，从 10,700 万铢减少到 7,900 万铢。”<sup>[3]</sup>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给整个泰国带来严重的破坏性影响，工商业纷纷倒闭，物价疯涨，大批农民破产，民不聊生，社会上到处都充斥着不满的情绪。最终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压迫与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这些长期隐伏着的各种矛盾终于激化，爆发了要求废除封建专制、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一九三二年政变。但政变之后，旧有的社会矛盾并没有解决，贫富悬殊、阶级矛盾、民生问题依然严重；保皇派又于 1933 年发动了武装叛乱，企图复辟。可以说泰国国内的局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处于动荡不安之中。西巫拉帕的《画中情思》正是诞生在这样内忧外患的时代大背景之下，所以，与《雷雨》一样都具有其独特的思想内涵和深厚的社会意义。

相似的时代背景，相同的民族危机，使两位作家的创作从一开始就镌刻着浓厚的时代烙印，背负着强烈的历史使命。

## 二、新文学形式的集大成者

伟大的哲学家恩格斯曾经说过：任何一个人在文学上的价值都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而只是同整体的比较当中决定的。因此，评论一个文学家的历史地位，就必须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将其置于具体的文学历史、社会环境之中，

[1][苏]尼·瓦·烈勃里科娃.泰国现代史纲(1918--1959).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5

[2][美]戴维·K·怀亚特.泰国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230

[3][苏]尼·瓦·烈勃里科娃.泰国现代史纲(1918--1959).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55

来考察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与贡献。曹禺之于中国话剧，与西巫拉帕之于泰国小说一样，其重要性都是无可替代的。《雷雨》《日出》《北京人》的发表，标志着中国话剧文学的高峰；而《生活的战争》《画中情思》《向前看》的出现，则同样昭示着泰国小说的成熟。可以说，他们都是各自国度新文学形式的集大成者。

中国现代的话剧是一种来自欧洲的文学形式，因其在内容与形式方面有别于传统戏剧，故早期的话剧又被称为“文明戏”。中国早期的话剧还受到日本新派剧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易卜生、莎士比亚等戏剧大师的作品被译介到中国，开始出现了最早的话剧剧本，现代话剧运动也开始兴起。胡适的《终身大事》、陈大悲的《幽兰女士》揭开了现代话剧剧本的创作序幕。此后，田汉、欧阳予倩、洪深、丁西林、郭沫若、李健吾等人也都以自己的创作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但从“五四”前一直到三十年代，中国现代话剧文学却还处于徘徊的阶段，仍未发展为完整成熟的文学形式。绝大多数的剧本都还是短小的独幕剧，田汉的《获虎之夜》、丁西林的《好儿子》、洪深的《五奎桥》莫不如此。话剧这种新的文学形式还“缺少驾驭深刻反映广阔现实生活、人物众多、冲突复杂、结构宏大的多幕话剧文学样式的功力”<sup>[1]</sup>，话剧也因此而缺乏持久的生命力。直到曹禺《雷雨》和《日出》的发表才正式宣告了中国现代话剧这种新文学形式的成熟，这也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曹禺的话剧都是取材于当时的现实生活、当时中国社会和家庭中的人与事，并从这些现实生活中提炼悲剧冲突，抨击黑暗的社会，表达反封建与个性解放的要求。在曹禺的话剧中，人物、冲突、结构、语言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话剧创作的典范。

他笔下的人物，如繁漪、周朴园、周萍、陈白露、愫芳、曾文清等，也都成了中国话剧史上不朽的形象。积极吸取前人话剧创作的经验，并融入自身对话剧创作的独特体验，可以说，曹禺正是中国现代话剧的集大成者，他也以其创作将中国现代话剧创作推向了高峰。

诗歌和戏剧是泰国古典文学的正宗，在泰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到了近现代，从国外引进的小说才开始进入泰国读者的视野，从而开始了泰国小说的发展历程。一直到19世纪末，泰国才有了模仿英国短篇小说而写成的第一部短篇小说《沙奴的回忆》，而第一部长篇小说的诞生则要等到三十多年后的《并非仇敌》。纵观泰国文学史可以发现，印度文学、中国文学及西方文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对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印度文学对泰国文学的影响主要在诗歌方面，而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则主要在小说方面。自曼谷王朝一世王时代《三国演义》被翻译介绍到泰国后，大量的中国历史演义故事陆续被翻译成泰

[1]朱栋霖.论曹禺戏剧与我国话剧文学样式的发展.转引自:邹红.曹禺研究 1979~2009.辽宁: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2

语，形成了一股“中国热”。这些小说对泰国叙事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但真正催生了泰国小说的却是西方的翻译小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国家的武力侵略，西方文化也开始潮水般涌入东方各国。这一时期，西方文学在泰国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文学。但由于早期的翻译家、作家都是皇室成员，他们把文学当做消遣的工具，赏玩成了文学的第一要义，因此当时文学的思想性及艺术性都不高，消遣文学成了文学的主流。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以西巫拉帕为代表的一批青年作家登上文坛，大声疾呼“要把赏玩变成严肃的工作”，并身体力行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正是西巫拉帕等人认识到了消遣文学的弊端，开始倡导严肃的现实主义创作，才推动了泰国小说的发展，并最终走向成熟。在将近五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西巫拉帕始终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写下了近二十部重要的作品，如《男子汉》《生活的战争》《画中情思》《后会有期》《向前看》等，这些作品奠定了西巫拉帕在泰国文坛上的地位，更为泰国小说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人们称他为英雄，尊他为泰国文化界‘元帅’，‘泰国文学天空中的王鸟’”<sup>[1]</sup>。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内忧外患的时代环境造就了曹禺和西巫拉帕这两个文学巨匠，而他们也以一系列的优秀作品彰显了他们在乱世中的地位及价值。而作为各自文学领域的集大成者，他们又分别以自身的创作对中国现代话剧和泰国小说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现实主义创作上，他们殊途同归，都高扬现实主义的创作大旗，针锋相对地批判旧的传统文学样式，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关注人性，关注现实社会中被忽视、被异化的人群。

---

[1] 栾文华. 泰国文学史.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262